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 张旭东 张育成

五四运动前夜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这一切使人迷惘，但又迫使新一代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等问题。这一群体中就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1913年春至1918年夏（1913年春—1914年春在第四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在校长孔昭绾主政下，“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宗旨”，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罗学费、张昆弟、周世钊、萧三等。他们纷纷聚集在堪称培养新青年摇篮的湖南第一师范，求知、立志、爱国。在他们的吸引下，被称为周南女校“周南三杰”的向警予、陶斯咏、蔡畅，周南女校中部的杨开慧等也纷纷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勤学好问，以文会友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面有一所大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一位官员留下的产业，当时，第一师范的老师大多住在这儿。1914年上半

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陈昌等同学组织成立课外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到芋园问学。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他们探讨学问的对象。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他们不仅向老师问学，同学之间也是有遇必论。毛泽东经常于假日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费等五六位好友，到“板仓杨寓”学习讨论各种问题，或谈治学、做人之道，或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教民的真理，常常一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应关心“大事”，即“人的人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15年，时年22岁的毛泽东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7月，他写信告诉萧子升：“第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带着求友心切的心情，毛泽东在9月中旬以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为友，“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应者有李立三等五六人。之后，他们也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就常漫步市郊各胜处，谈论包括治学方针与方法、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

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读“无字之书”，就是指接触社会实际，参加社会实践，学习社会

知识。第一师范学校的校章规定，“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1914年，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空余时间，邀约同学以“游学”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他们身无分文，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的一些乡镇，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行程900多里，历时一个多月。在游学中，他们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等各种人。1918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游学，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了解了农村社会，接触了农村各阶层群众，锻炼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为他们日后养成注重调查研究之风，关注农民农村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师范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非常热爱体育锻炼，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他和罗学费等同学常到湘江挥臂击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1916年前后，毛泽东的同学贺果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当时湖南选派了7名代表，其中一师就有3名。体育锻炼不但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同学们的自信和意志。1917年10月校友会改选，毛泽东担任了校校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为文学部部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校友会开展了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许多课余活动。这年下半年，校友会成功地举办工人夜校。同学们亲自起草招生广告，主持开学仪式，兼任教员，与工人建立了深厚感情。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南向北溃退。长沙是溃军必经之地，校友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学生自愿军担负起护校的任务。18日，有一支3000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道长沙城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附近徘徊。毛泽东率领学生军配合当地警察鸣枪呐喊，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军不敢抵抗，全部缴枪投降。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

读书立志，心忧天下

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他们以“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之学”作为自己学习的目的。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

编印成册，取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以激愤的心情在封面上写下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标志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很快，他们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在一起讨论不下百次，通过讨论，最终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这个团体正式组建为新民学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三等13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学会以“革新学

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此，毛泽东等一批有志于国家的热血青年，聚集在新民学会，开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学生时代的真实写照。在学生时代，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后来对他的学生时代这样评价：“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学生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他们那种求知、立志、爱国的人生取向仍弥久恒新，这种真谛虽时代不同仍值得回味、值得总结、值得借鉴，更值得当今青年人去认真体会。



图为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剧照

从《贞观政要》看「贞观之治」

□ 赵璐璐

唐朝在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局面，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常为后来历代史学家和政治家称道。也成为中国治国传统中的一个里程碑。“贞观之治”局面的开创，与贞观时期的治国方略密切相关。总结贞观君臣对于治国安民理论和方略进行探讨的《贞观政要》，便成为后世帝王的治国教科书。该书从唐代以后，就一直被作为历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古代的日本和朝鲜等地，是古代东方政治智慧的代表作。书中总结的许多政治原则，如勤政爱民，恪守公道；选贤任能，扬长避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等，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臣吴兢编写的一部关于唐太宗君臣治国安邦经验教训的语录体著作。吴兢生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逝世于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从小好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期，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后又出任州司马、刺史等职。他任史职前后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吴兢一生笔耕不辍，他认为，“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因此，研究和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总结唐太宗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探讨“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便成为吴兢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撰写《贞观政要》的目的之一。

对贞观时期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关怀，促使吴兢在开元时期撰写了《贞观政要》一书。全书通过对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的总

结，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一目的在其所作《上〈贞观政要〉表》中清楚地揭示出来：“至于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望纤天鉴，择善而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易》不云乎，‘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无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序》又进一步强调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国有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无论《表》还是《序》，其所坦陈的，均是《贞观政要》编撰的目的，那就是《贞观政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乃至后世的皇帝准备的必读书；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值得后世认真总结和学习，贞观时期的治国理政经验是后世制定方针政策的参考依据，唐太宗应该成为后世皇帝的目标和榜样。

《贞观政要》全书共10卷40篇，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剪裁，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以卷分类，分别辑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争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措施等。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君道》《政体》《任贤》《纳谏》等40个专题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二）

《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既是唐

太宗君臣反复讨论过的治国方略、励精图治的行动纲领，更是努力实践的良好结果。这一结果便是被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可以说，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最早总结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有许多具体的描述，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贞观三年年成稍有好转，流亡他乡的百姓都纷纷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其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而这种信任无疑来自唐太宗本人的人格魅力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所营造的良好政治风气。用吴兢的话说，就是“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其次是政治清明，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尽管唐太宗的掌权来自一场政变，但他并不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当初的政敌，皆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尤其是重用包括魏徵在内的前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臣子，成为历史上君臣相得的典范。政治风气的建设对君臣都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就君主而言，关键是如何兼听纳谏，创造一种臣子敢于进谏的政治氛围。《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徵借此提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营造了融洽的君臣关系和清明公正的政治气氛。

再则社会风气有了根本好转，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所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在接着几年丰收之后，逐渐呈现出太平景象，《贞观政要》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

海，皆不资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关于“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论断，也是后来史书描述“贞观之治”图景的关键材料。

（三）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对“贞观之治”局面的以上描述，对深入认识和理解“贞观之治”留下了几个方面的启发：

一是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生产还远远没有恢复到隋朝鼎盛时期的发展程度，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经济上的危机局面。同时又面临着北方强大的突厥的威胁，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应该说，贞观四年打突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战争。唐朝的取胜，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老百姓对建立不久的新王朝的一种期望、一种信心，人心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因素。

二是百姓的信心和斗志，来自贞观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说，实行教化、轻徭薄赋的政策，是天下大乱之后的正确选择。全国上下都有着为国家着想の积极意识，皇帝为民担忧，励精图治，崇尚节俭；老百姓也替皇帝着想，理解政府的难处，即使四处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愤发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这样，即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困难，社会秩序也不会乱。只要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很快就能够恢复社会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有天下为公的气魄。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污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地加以重用，把他们放到重

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和实践中的这些表现，才有可能出现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很快稳定。所以探讨“贞观之治”的出现，不能忽视唐太宗的核心作用。

四是所谓“贞观之治”，不仅应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应当包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线方针正确，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大动荡大破坏之后，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才能恢复元气。贞观三四年间局部地区的丰收，并没有完全扭转经济凋敝的情况，是经过“频致丰稔”，也就是连续多年的丰收之后，才出现了米价下跌，粮食充裕的大好形势。当然这样一种经济的发展和恢复也仍是初步的，远没有达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天宝盛世的局面。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主观和客观背景，而《贞观政要》所记载的贞观君臣对于治道术的探讨与实践，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应该说《贞观政要》的记载揭示了“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另一方面，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著的记载贞观君臣讨论治道术的史书《贞观政要》，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帝王教科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安民的智慧结晶。从这个层面上理解，《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彼此互相成就，共同编织出后人观念中对贞观一朝君臣形象和历史地位的认知。

历史文化

典籍